

顺应理论下的翻译策略与方法

——以《红楼梦》杨宪益英译本为例

彭俊, 钟文

(南京审计学院 外国语学院, 江苏 南京 211815)

摘要: Verschueren 的顺应理论为从语用学的角度研究翻译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翻译策略和方法的选择应该分别实现对宏观交际语境和微观语言语境的动态顺应。归化和异化是实现动态顺应的翻译策略, 直译和意译则是翻译方法。《红楼梦》的杨宪益译本为顺应论视角下翻译策略和方法的成功选择提供了例证。

关键词: 顺应理论; 《红楼梦》杨宪益英译本; 翻译策略; 翻译方法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8750(2011)04-0084-05 **收稿日期:** 2011-03-21

作者简介: 彭俊(1977—), 女, 重庆人, 南京审计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 钟文(1967—), 女, 安徽铜陵人, 南京审计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语用学和跨文化交际。

基金项目: 江苏省教育厅课题(2011SJD740020); 南京审计学院基金项目(NSK2009/B30)

一、引言

翻译的策略和方法历来是翻译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 但是翻译本身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历史不算太长, 理论发展也还没有达到非常完善成熟的地步。在很多情况下, 若仅就翻译而谈翻译, 把翻译研究局限在其自身领域内, 其深度和广度就无法突破樊篱, 难以取得较大发展, 因此, 本文借鉴语用学的理论, 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把 Verschueren 的顺应理论引入翻译实践, 从顺应的角度探讨总体翻译策略的选择和具体翻译方法的取舍, 并以《红楼梦》的杨宪益英文译本为研究范例, 对杨译本翻译策略和方法的成功选择作出顺应性解释, 以期对翻译工作者的研究和实践以及翻译教学提供一定的借鉴。

二、顺应理论及其对国内翻译研究的影响

Verschueren 于1999年提出了语用学综观论和语言顺应论, 具体分析了语言顺应性研究的四

个角度: 实现顺应性的语境关联(the contextual correlates of adaptability), 实现顺应性的结构客体(the structural objects of adaptability), 顺应性的动态实现(the dynamics of adaptability) 和顺应过程的意识突显(the salience of the adaptation processes)。这四个方面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 以动态顺应为核心, 从不同角度阐释了语言的动态使用和选择。

顺应理论的提出, 对国内的翻译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许多学者开始把它和翻译结合起来, 做了大量的拓展性研究。陈喜华主张在翻译过程中应从语言语境和交际语境两个方面来进行顺应翻译^[2]。戈玲玲提出“目的语的重构是译者对原语的语境、语言结构之间作出动态的顺应过程”^[3]。宋志平则直观地指出“翻译是连续选择的过程”, 不管是译本还是文化立场的选定, 抑或是文本意义、信息加工的取舍, 都是译者进行积极选择的过程^[4]。王建国认为归化、异化、直译和意译都只是具体的翻译方法, 并且他以语用顺应论为基础提出了新的翻译策略——动态顺应^[5]。

除了上述理论层面的研究外,还有一些学者把顺应理论融入不同体裁的翻译实践中去,力图为具体的翻译实践找出更加行之有效的办法。另有学者利用具体的文本如《围城》来进行文化顺应性翻译研究。《红楼梦》也是研究热点之一。

总体来说,不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翻译进行了颇有意义的顺应性研究和阐释,以证明顺应论对翻译实践的指导作用。然而,同时从宏观和微观层面探讨顺应论下的翻译策略和方法的研究并不多。把归化、异化和直译、意译等同于具体翻译方法的观点笔者持有异议,而把动态顺应作为新的翻译策略似乎也比较宽泛,在翻译实践中指导意义不大。笔者认为,动态顺应是选择具体翻译方法的要求和目的,此外,从现有的《红楼梦》顺应性研究看来,学者们关注的都是微观层面上的细节问题,如社交指示语、语境或个别人物语言等,目前尚无对杨宪益英译本宏观翻译策略和微观翻译方法进行顺应性阐释的研究。本文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以《红楼梦》杨宪益英译本为例,具体探讨翻译实践中译者在决定总体翻译策略和具体翻译方法时所进行的选择和顺应。

三、翻译策略和方法的选择与顺应

Verschueren 认为语言使用是连续选择的过程,宋志平据此认为“同一切言语交际活动一样,翻译的过程也是一个连续选择的过程”^[4]。在笔者看来,这种连续选择的过程,首先是在交际语境下基于译者文化立场的、宏观性的、具有全局指导意义的翻译策略的选择;然后它是在语言语境下发挥主体的顺应意识并针对结构客体特征动态选择合适的翻译方法,用以处理翻译过程中遇到的具体的字、词、句等微观语言单位。

王建国认为直译、意译、归化和异化“处于同一层次,都是翻译方法”^[5]。这种提法在笔者看来有待商榷。在顺应理论的视角下,所谓翻译策略应该是在正确理解原文基础上预先思考怎样应对翻译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如“处在意义和形式得失漩涡中的文化身份、文学性乃至话语权利的得失问题”^[6],从而制订相应的方案。这种方案应该能多层次、多角度地顺应交际语境的三个方面:社交世界、物理世界和心理世界。它是纵观整个翻译过程的全局、具有前瞻性和实践指导意义的总体方针。事实上,归化和异化正是站在

策略的高度,不是仅仅针对某一具体语言单位的取舍和变异,而是从宏观的角度,以纵观全局的大语境视角来考虑民族文化的价值取向。

根据 Verschueren 的顺应论,任何言语行为都是在顺应和选择的动态过程中完成的。那么,翻译作为跨文化再现源语信息的言语行为,自然也是在顺应和选择的过程中完成的。这种选择不仅是某个单词、某个短语或句子的微观语码的选择,而且是站在纵观全局的高度,首先选择译者的文化立场。正如鲁迅所说:“动笔之前,就得先解决一个问题:竭力使他归化,还是尽量保留洋气呢?”^[7]而翻译方法,便是在宏观翻译策略的指导下,基于某一语言单位的处理步骤和手法,是具体而微观的。它是某个语篇中以字、词、句、句群甚至段落为单位的小语境下的语言顺应和选择。翻译方法不是机械或一成不变的,而应该是动态的顺应和选择。具体到微观的语言语境中,翻译方法的选择主要有两种,即直译和意译。简而言之,直译就是直接翻译,译者寻找对应词汇直接翻译源语,而把原作中不易理解的部分和可能造成文化冲突的部分留给译本读者,它是异化策略的一种具体方法,一般对应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的输出;而意译就是根据意义翻译,把原著中不易理解的部分和可能造成文化冲突的部分都解释清楚,甚至添加注解,有时甚至删除或者改译部分内容,它是归化策略的一种具体方法,一般对应弱势文化向强势文化的介绍性翻译。

顺应理论下翻译方法的选择主要是动态地实现语言语境的顺应,篇内衔接、篇际制约和线性序列等方面的考虑都是选择翻译方法的根据。此外,结构客体顺应和译者在顺应过程中的意识程度两个方面也需要加以考虑。

四、《红楼梦》杨宪益译本中的翻译策略与翻译方法

(一) 总体翻译策略——宏观层面的选择与顺应

作为一部“文化小说”,《红楼梦》中的很多文化内涵都是外国人难以理解的。在杨宪益动手翻译之前,面对这样一篇恢宏浩大的“文化小说”^[8],他必须首先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小说中的中华文化,是应该原汁原味地保留下来,尽量忠实地全面地传达给外国读者,还是为了避免文化冲击,放弃

这些外国人难以理解的文化信息,而用他们能理解、能接受的形象或意境来表达呢?这种思考,正是杨宪益对自己文化立场的选择。这种宏观性选择的重要性,显然用“方法”两个字不足以担当,而只能是“策略”。结合上述顺应理论,在选择总体翻译策略以实现宏观层面的顺应时译者必须要考虑到语境关联,主要是交际语境的关联,包括社交世界、物理世界和心理世界。

从社交世界和物理世界来看,杨宪益夫妇翻译《红楼梦》的浩大工程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一度中断后最终完成于70年代后期。这一时期正是中国外交冲破艰难险阻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阶段。在当时,面对美国的敌视政策,为了争取更多的盟友,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和权利,毛泽东指出,对亚非拉各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必须给以积极支持。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中国政府积极发展同亚非拉新兴独立国家的关系。这种社交世界和物理世界,正如张曼所说,“中国自建国始,到1970年代中期的外交伙伴一直是以亚非拉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主”^[9]。

此外,杨宪益夫妇的《红楼梦》翻译工作也不仅仅是一种个人行为,而是有组织、有目的的。他们于1953年被调到外文出版社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社工作,该刊物一度是中国文学作品“走向世界”的唯一窗口,而所谓的“世界”,因为当时我国和欧美世界的文化交流渠道受限,主要就是指“亚非拉的社会主义国家”。1964年,应外文局出版社要求,杨宪益开始翻译《红楼梦》,向外国读者介绍中国古典文化。可见,“杨先生夫妇翻译《红楼梦》时,中国文学更多的也是与亚非拉等国的文学发生交流”^[9]。

除了社交世界和物理世界的影响,心理世界也是影响译者宏观翻译策略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从译者的心理世界来说,《红楼梦》翻译工作是上级委派的重任,这就使得杨宪益夫妇具有一种使命感,那就是向世界介绍中国经典著作,传播中华古典文化。既然要传播中华文化,自然不能迎合西方的价值观和审美趣味,而要尽力在译作中保留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这一点只有异化的翻译策略才能做到。而从读者的心理世界来分析,想读并且愿意细读《红楼梦》这样一部鸿篇巨制的外国读者,大多不是仅仅为了简单的猎奇,他们对中国古典文化多半具有强烈的好奇心甚至是

仰慕之心。译者要顺应这样的读者心理,也必然在《红楼梦》的翻译中采取异化策略。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杨宪益在翻译时采用的异化翻译策略是一种文化立场的选择,是对当时中华文化所处社交世界和物理世界的一种动态顺应,同时也是对译者自身的使命感和那些异国读者渴望了解中国文化的心理世界的顺应。

异化的宏观翻译策略一旦选定,必定贯穿整个文本翻译的始终。就杨译版《红楼梦》而言,不论是小说题目或章节目录的翻译,还是文中诸多对宗教、服饰、食物、称谓语等文化项的处理,不分巨细,随处可见这种翻译策略的影响。作为一部鸿篇巨制的标题,《红楼梦》这三个字无疑起到了画龙点睛、揭示主题的作用,是透视作者创作意图的一扇窗户。“红楼”中的“红”字,蕴含了中华民族的色彩审美观,古代王侯贵族的住宅大门都漆成红色来显示自己的尊贵。“红”即是“朱”,“红楼”正是“朱门”的影射,是古时豪门大户、贵族之家的代称,而《红楼梦》讲述的正是贾、薛、王、史四大家族由盛而衰的“黄粱一梦”。虽然只有简短的三个字,但“红楼梦”的内涵意义和文化背景不容忽视,在英译过程中对这三个字的处理将会对译文读者产生重大作用,直接影响到他们对整个译本精神实质的理解和把握。杨宪益、戴乃迭把“红楼梦”译为“A Dream of Red Mansions”^[10],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冒着一定风险的,对于英语读者来说,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异化,因为和汉语言民族对“红色”的爱好大相径庭,在英语言文化中,“红色”往往代表着“灾难”和“血腥”。杨宪益在选择“red”一词时,就选择了自己的文化立场——要把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输出给世界,使英文读者认识到中西文化间的差异,体会神秘东方的博大深远。这种文化价值观念的输出顺应和满足了那些真正热爱和探寻中华文化的外国读者的心理世界,也达成了译者自己的文化使命。

作为明清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红楼梦》中自然也映射出了当时中国的宗教现状,以儒、释、道三家为主,既有孔孟礼教,又有佛教思想和道家学说。例如书中无论王亲贵族,还是平民百姓,都常把“阿弥陀佛”挂在嘴上。杨宪益将其译为“Supreme Buddhist”、“Gracious Buddha!”或是“Amida Buddha!”。总体说来西方人对佛教是比较陌生的,西方读者自然也不太熟悉所谓的

“Buddha”,日常生活中也不会像中国人一样将其用作口头诵颂的佛号,表示祈祷祝福或惊叹的意思。因此,从杨译版的这些例子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异化的痕迹。杨宪益并没有用英语读者习惯的诸如“God bless me”或“God bless my soul”之类和上帝有关的西方宗教用语来进行文化代入,而是坚持中国文化的输出。

关于服饰,《红楼梦》中有诸多对各个阶层、各种人物的详尽描写。第三回中王熙凤出场时的一身装扮生动地展示了当时贵族妇女的着装风格,是其身份和财势的象征。译本中的“phoenixes facing the sun”、“coiled dragon”、“pea-green tassels”和“red jade pendants”都是异化处理,对于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英语读者来说,这些都是一种文化输出,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情趣和服饰文化,异域风情十足,具有较强的视觉冲击力,为热爱和想真正了解中国文化的英文读者提供了原汁原味的翻译版本,顺应了他们求新求异的心理世界。

(二) 具体翻译方法——微观层面的选择与顺应

如前所述,杨译《红楼梦》在翻译策略层面选择了异化,而这种翻译策略一旦确认,具体的翻译方法就应该与之相适应。杨的具体翻译方法是以直译为主,意译为辅,直译、意译相结合。这种翻译方法可以从四个方面用顺应论来加以阐释。

首先,杨译本的翻译方法实现了语言语境的顺应。语言语境的顺应需从篇内衔接、篇际制约和线性序列等方面进行考虑。杨宪益英译本中很多译例都是针对具体而微的语言小语境(即上下文之间的衔接和连贯),选择直译为主,意译为辅的翻译方法,从而成功地实现了顺应。

原文:探春登时大怒,指着王家的问道:“你是什么东西,敢来拉扯我的衣裳!我不过看着太太的面上,你又有年纪,叫你一声妈妈,你就狗仗人势,天天作耗,专管生事……”(第七十四回)

杨译:“Who do you think you are?” she fumed, pointing one finger at her. “How dare you paw me? It’s only for Her Ladyship’s sake and because you’re old that I call you ‘nurse’, but like a dog counting on its master’s backing you’re always making trouble…”

此段中的“狗仗人势,天天作耗”,杨译版为

“like a dog counting on its master’s backing you’re always making trouble”,显然这就是译文为了“刻意求真,通过保留原作形貌(表达方式)来保持原作的内容与风格”^[11],当属直译。同时,为了顺应“狗仗人势”的语境,在翻译“你是什么东西,敢来拉扯我的衣裳!”时,译者选择了动词“paw”来意译“拉扯”,表示“用狗爪碰触”。就这样,“paw”和“dog”遥相呼应,直译和意译巧妙配合,实现了篇内衔接,忠实而顺达地表达了原文意思。而原文中的“妈妈”一词,显然并不等同于现代汉语中的“母亲”。根据原著的信息,此处的“妈妈”只是场面上给年纪较大、较有资历的管家婆子等中老年妇女的一种表示看重的称呼,和宝钗称呼自己母亲的“妈妈”完全是两个概念,因此,受原著情景因素的影响和篇际制约,杨宪益用了“nurse”一词意译,在英语语言文化中相当于对保姆或奶妈等仆人的称呼,符合人物的真实身份,顺应了当时的语言语境。此外,关于语言语境中的线性序列,杨宪益的这段译文在选择语言时根据语篇上下文的逻辑和语义关系,对探春话语所作出的先后安排总体上符合原文的次序,属于直译,只是在第一、第二两个问句之间灵活插入了探春的表情和肢体语言,使译文显得自然而不僵硬。

其次,杨译本的翻译方法实现了结构客体的顺应。从词汇的使用习惯上看,汉语为了气势或强调往往喜欢重复使用同一词汇,而英语则追求形式的多样和变化因而倾向于替换,使用不同词汇来表达同一意思。因此,《红楼梦》原著中众人在称呼贾母时不分男女老幼、尊卑贵贱,皆重复使用“老太太”这一称谓,杨宪益的英译本则使用了六种不同的英文称谓来翻译同一个中文称谓语“老太太”:“mother”、“grandmother”、“madam”、“Your Ladyship”、“the Lady Dowager”以及“the old lady”。这些称谓语中有直译也有意译,是杨宪益在深谙汉英差异的基础上对目的语结构客体所作出的主动顺应。

再次,杨译本的翻译方法体现了顺应的动态性。如上所示,杨译《红楼梦》的具体翻译方法是以直译为主,意译为辅,直译、意译相结合。这种翻译方法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和机动性,动态地顺应了具体的语言语境和结构客体特征。

最后,杨译本中翻译方法的选择体现了译者在顺应过程中的意识突显。在具体翻译方法的选择

择和顺应过程中,杨宪益、戴乃迭两位译者主体意识的突显不容忽视。两人皆浸淫中英文化数十年,具备深厚的中文功底和精湛的英文表达水平,更重要的是他们深谙中西文化背景差异,因此才能准确地选择翻译方法,顺应不同的语境,用忠实、流畅而优美的英文将《红楼梦》这部文化巨著翻译出来,使之流传于世。

五、结语

翻译并不仅仅是语言之间的简单转换,而是涉及历史文化、意识形态、译者主体性、读者对象等诸多因素的复杂工程,借用语用学的视角来研究翻译大有裨益,Verschuieren 的顺应理论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语用学研究框架,拓展了翻译研究的视角。译者必须意识到,翻译的过程就是选择和顺应的过程,这个过程受到交际语境、语言语境和结构客体的制约,同时也是动态的顺应过程,其中包含译者的顺应意识突显。在翻译实践中,首先要发挥翻译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提高译者的语言把握程度,为顺应过程中的意识突显打好基础,这样才能从总体翻译策略制定和具体翻译方法选择这两个层面实现宏观和微观的动态顺应,才能做到成功翻译。在翻译教学中,对学生顺应意识的培养能使学生意识到各种语境的重要性,并能帮助其加深对结构客体特征的认识,加强自身的语言修养,从而最终提高其翻译水平,选择正

确的翻译策略和方法。

参考文献:

- [1] Verschuieren J.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 [2] 陈喜华. 试论翻译中的语境顺应[J]. 湖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1(12): 158-160.
- [3] 戈玲玲. 顺应论对翻译研究的启示——兼论语用翻译标准[J]. 外语学刊, 2002(3): 7-11.
- [4] 宋志平. 翻译: 选择与顺应——语用顺应论视角下的翻译研究[J]. 中国翻译, 2004(2): 19-23.
- [5] 王建国. 从语用顺应论的角度看翻译策略与方法[J]. 外语研究, 2005(4): 55-59.
- [6] 王东风. 归化与异化: 矛与盾的交锋[J]. 中国翻译, 2002(5): 24-25.
- [7] 鲁迅. 鲁迅全集: 第六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352.
- [8] 周汝昌. 红楼梦与中华文化[M]. 上海: 中华书局, 2009: 5.
- [9] 张曼. 杨宪益与霍克斯的译者主体性在英译本《红楼梦》中的体现[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6(4): 111-112.
- [10] Yang Xianyi, Gladys Yang.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94.
- [11] 乔曾锐. 译论[M]. 北京: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2000: 244.

(责任编辑: 黄 燕)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nd Metho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daptation Theory: A Case Study of Yang Xianyi's Translation of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PENG Jun, ZHONG Wen

Abstract: Verschuieren's adaptation theory provides a new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translation study from the pragmatic perspective. Influenced by various contexts and the structural objects,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indeed represents dynamic adaptation and involves constant choices. As two macroscopic translation strategies, foreignization and domestication are chosen to adapt to different communicative contexts while literal translation and liberal translation as two microscopic methods are adopted to suit for relative linguistic contexts and the structural objects. A case study of analysing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translated by Yang Xiany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daptation theory is expected to throw some light on translation theories study and practice as well as translation teaching.

Key words: adaptation theory; Yang Xianyi's translated version of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translation strategy; translation methods